

郑观应的“盛世危言”

石 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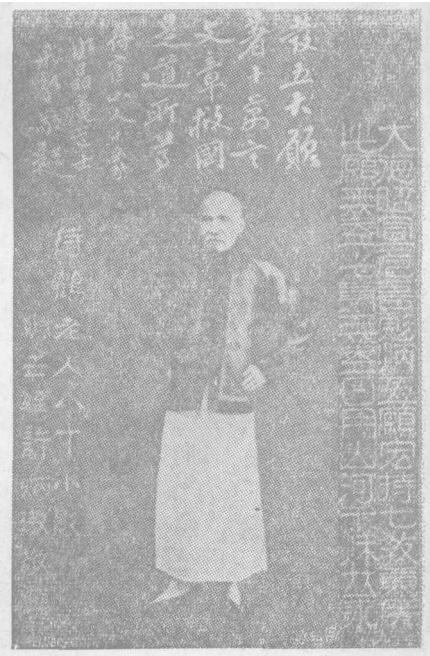
从19世纪下半期起，中国开始有了一批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官僚、地主和商人。他们为了抵抗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摆脱封建政治势力对工商业自由发展的控制，要求一定的政治地位来保护他们的经济利益。这样，就使这个时期初步具有资产阶级观点的改良主义思想更加流行起来。虽然这种思想对于封建制度来说，还不是站在根本对立的地位，但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依然是有进步性的，因为它终究是与当权的封建统治集团顽固派进行了斗争。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后出版了许多宣传这种“新思想”的著作，其中“盛世危言”，无疑是影响后来较大的、最著名的一种。毛泽东主席在青少年时代也曾以极大的兴趣，仔细地阅读过这一本对“戊戌变法”的政治改良运动起过前导作用的代表作。

“盛世危言”的作者郑观应，生于1841年，广东香山（中山）县人。1860年英法侵略军联合攻入北京，使他进一步感觉到民族的危机，决心放弃参加封建朝廷的科举考试，去上海从事经商，同时学习西方语文，后来曾亲身参加一些官督商办的工业，并担任过重要职务。他在工作期间，游历各处，经常注意考察研究中外政治的得失利病，把他认为有关“安内攘外”的办法，根据自己的认识，综合各方面的言论，随时整理，在报上发表，这就是本书的初稿。以后经过增删，于1862年收集成“救时揭要”，传至日本，曾有翻刊。1871年又出续集，分上下本，名曰“易言”。再后四年，将全稿三十六篇，由他的朋友沈谷人、谢綏之等删并成二十篇，仍名“易言”，在香港印行。1893年又有增订，始改名“盛世危言”，以后并陆续出版二集、三集：计初编六卷，二编四卷，三编六卷。就以上三编的文章，按性质分类重排：（1）富国、（2）强兵、（3）开源、（4）节流，则是通行的“增订新编”。这部书不限于本人的作品，也有是作者赞同的见解，被选入本书的，例如“农功”可能系孙中山手笔，但是一样可以代表作者的思想。此外，他晚年又把一些杂著以及公私来往信件等，分类编排，印行“盛世危言后编”，这已在1909年，接近辛亥革命的前夕了。

谈到“盛世危言”一书的内容，同时著名的改良主义者王韬1880年在“易言原跋”中亟称“于当今积弊所在，

抉其症结，实为痛彻无遗，……”。而当时正在写“庸书”的陈熾1893年为“盛世危言”一书作序，也大加称赞，说他这书“综贯中西，权量今古，……淹雅翔实，先得我心，”甚至表示他目前没有必要再继续他的写作了。由此可见，这书是如何受到他同时的一些改良主义者的重视。郑观应在他的“盛世危言初刊自序”中，把他全书的宗旨和内容，作了概括的说明。就是他认为国家“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必须进一步学习西方，使“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畅其流”。在“西学”一篇中，不特强调了科学是“中国本有之学”，又明确的反对了当时两种阻止向西方学习的不正确的态度：一种是认为很难学会的苟安心理，另一种是认为不值得学的保守思想。由于他是一个改良主义者，虽然一方面提倡“西学”，但是，又说“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明确地表示无须乎根本推翻现行的政治制度和全盘接受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作者认为当时中国不如西方的一切，像铁路、电报、邮政、银行、开矿、船政、纺织，乃至防海、练兵等无不一一谈到。而且又进一步的提到议院、考试、吏治、公法、税则等有关政治改革的方案和设立日报、医院等具体措施，实在是一个比较全面的计划。但他在全书第一篇冠以“道器”，又慎重的申明所变的只不过是“器”而不是“道”。

郑观应“盛世危言”一书比较深刻的



地方，是作者認識到外国資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目的，主要在夺取中国的經濟利权，他觉得西方資本主义国家的内部經濟的不断發展，必然要“以亞洲各国为取材之地，牟利之場”。（“商务”）他認為这种經濟侵略甚至比軍事侵略更为可怕。因此，他認為中国要真正富强，可以抵抗外国的侵略，必須和外国資本主义列强进行“商战”。他反对洋务派宣称的买軍火，練洋操就可以使中国自强的看法。他又認為中国工商業所以不能發展的原因是由于“中国有困商之虐政，無保商之良法”。指出当时封建买办官僚是“护外商”而“削华商”，因此他主張設“商会”立“商部”来保护新兴資產阶级的利益。他認為“論商务之源”，首先要發展机器制造工業，所謂“各种机器自能制造，則各种貨物亦自能制造。”又說：“能自制机器，始得机器無穷之妙用”。針對当时官僚資本家的機構臃腫，营私枉法，極力主張“欲扩充商务，当力矯其弊，不由官办，專用商办”的發展民族資本主义的政策。

这个时期的改良主义者郑观应已开始認識到西方資本主义国家所以“富强”，并不仅在于“炮船之堅利，器用之新奇”，而是在于他們有保障資產阶级利益的政治制度——議會制度。他觉得这是西方資本主义国家富强之“体”；至于新式武器和近代交通工具，只不过是他們的富强之“用”。他批判当时害怕学习西方資產阶级政治制度的洋务派所搞的新政是“遺其体而求其用”，因此“就令鉄艦成行，鉄路四通”，也是不足以抵抗外国侵略的。至于要使国际“公法”能有促进世界和平的作用，具体改革封建專制主义的政体問題，他依然是主張：“必先立議院，达民情，而后能张国威，御外侮。”（“議院”）

总之，郑观应所理想的政治制度只是想模仿像当时英国那样一种建立在封建地主阶级和新兴資產阶级相互妥协之上的君主立宪制度，甚至認為美国議院，都是“民权过重”的。所以他說：“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議院”）由此可見，他对于封建官僚的腐败政治是不滿意的，所以主張“君民共主”，但是他所謂“民主”的一面，具体說来，就是指的要給“有财产身家，善讀書負名望”的地方紳商以一定的政治地位，还不是直接为一般广大的劳动人民爭取任何的权利，那是很显然的。所以他这种改良主义思想的进步性还是有很大的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但是在中法战争后，由于民族危机的加深和洋务运动的开始破产，特别是封建买办官僚資本对民族資本自由發展的限制，为了不讓中国淪入半殖民地的地位，他們已經初步的認識到沒有政治的改革，是不可能实现經濟要求的理想的。换言之，要想發展民族資本，使中国真正能够独立富强，首先必需改革封建的專制政体，这是改良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發展，我們必須予以充分的注意。但是他們这种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張，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統治秩序

下，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兩座大山压在头上，企圖依靠反动政权的庇护，走資本主义工業化的道路，使中国独立富强，那完全是一种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幻想，这个問題，中国近代史已作了結論。



（上接第23頁）

你不要担心，在外面到处都有我們的同志，我会比在家中过得更好的。”輪船离开岸去，漸漸連影兒也不見了。想不到自此以后我就再沒有見到一曼！

別后从她的来信以及朋友們的口傳中，知道一曼在武汉中央軍事政治学校經受了严格的軍事生活的鍛煉。1927年宁汉分裂，蔣介石背叛革命后，党把一曼送到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在苏联期間她和陈大榜同志結了婚。因为她有肺病，苏联天气寒冷，对她的身体很不相宜，同时国内工作也很需要人，所以在1928年秋冬之交，党又送她回国。她身体不好，再加旅途跋涉劳頓，回到上海时已是奄奄一息了。然而一曼旺盛的革命精力並沒有为病体磨倒。她很快接受了組織的派遣，到宜昌做地下党的机关工作。不久被敌人發現，又逃回上海，从事組織工人，进行罢工斗争。1929年秋，党又派她到西省委工作，同年底組織又全被敌人破坏，她只得帶了孩子一路討飯逃回上海。那时候她們母子的生活艰苦極了，缺食少穿，孩子光腚，然而一曼的革命意志絲毫也不为动摇，而是更積極地为革命工作。那时刻我因搞革命被捕入獄，从此就失去了和一曼的联系。解放后我到处打听她的消息，后来听得何成湘同志說，1933年一曼去抗联工作时，他們曾談过話。何成湘同志当时担任中共滿洲省委組織部長，他們在哈尔滨也經常見面的。

一曼牺牲已經二十一年了。一曼出生在旧中国落后的偏僻山村中，自小嬌生慣养，少年时是个又任性又懶散的姑娘。在那样黑暗的年代里，是党引导她走上革命的道路。一曼历尽种种艰难困苦，却始終沒有动摇过，也無所畏惧，而是無限忠实于共产主义事業，逐漸成長为一个坚强的無产階級战士，为革命而英勇牺牲。她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光辉燦爛的。我虽然再也見不到她了，她的精神却永远鼓励着我前进。

（“赵一曼” 張麟等著 定价0.48元）